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SAFETY



全球化与 经济安全

全球化焦点问题丛书

主编：程光泉



龙文懋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全 球 化 焦 点 问 题 丛 书

全球化与经济安全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SAFETY

学术顾问：袁贵仁 韩 震 丰子义

主 编：程光泉

龙文懋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与经济安全/龙文懋 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3.7

(全球化焦点问题丛书/程光泉 主编)

ISBN 7-5438-3368-9

I.全... II.龙... III.经济一体化-影响-经济-
安全-中国 IV.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5412 号

责任编辑:张 莉

装帧设计:陈 新

全球化与经济安全

龙文懋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 66 号 邮编: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望城湘江印刷厂印刷

2003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8

字数:220,000 印数:1-3,000

ISBN7-5438-3369-7

C·154 定价:23.00 元

总 序

一个幽灵，一个全球化的幽灵，在世界各地徘徊。建立在道德和幻想基础上的乌托邦业已破产，建立在金钱和利益之上的乌托邦升出了地平线。在这个“美丽新世界”的大门口，政治家和跨国公司的老板用镀金的字体，联手写下了这样的口号：“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

一年多以前，我在哲学课上与学生讨论全球化问题时，一个同学给我写下以上的话。全球化的话语如此普及，乃至可以模仿马克思的口吻来宣布一个时代的主题，这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怀有相同的期待与焦虑，认为自己已经和正在经历社会的重大变迁，并进而深刻地改变自己的生活。

又逢世纪之交，人们又在忧心忡忡地思考我们时代的变化。有学者认为：“我们有更充分更客观的理由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历史变迁的重要时期。而且，这些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变迁并不局限于世界的某个地区，而几乎延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①“全球化就是以一种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构我们的生活方式。”^②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全球化问题成为我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全球化(Globalization)取代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一体化(Integration)和跨国化(Transnationalization)，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学术关键词。“‘全球化’挂在每个人的嘴边。这个风靡一时

① (英) 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第 2 页，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

② 同上书，第 4 页。

DAM 2014

的字眼如今已迅速成为一个陈词滥调，一句神奇的口头禅，一把意在打开通向现在与未来的一切奥秘的万能钥匙。对某些人而言，‘全球化’是幸福的源泉；对另一些人来说，‘全球化’是悲惨的祸根。然而对每一个人来说，‘全球化’都是世界不可逃脱的命运，是无法逆转的过程。”^①

的确，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客观历史进程，是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对全球化问题的讨论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最引人注目的话题之一。国外全球化问题的系统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达到高潮，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全球化思潮。近年来，全球化已经成了大多数政治讨论和经济论辩的核心问题，也是国际舞台上斗争的一个焦点。

我国对全球化问题的探讨进行得略晚一些。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国内经济学、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文学等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从各自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围绕全球化的相关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全球化成为世纪之交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所共同面对的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与此同时，全球化也开始越出学术界，成为政界、经济界的一个热门话题。随着中国加入 WTO 和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这一问题必将引起我国学界和社会各界更为广泛的关注。

我国出版界对全球化问题的介入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就开始了，目前已有套丛书面世，这些书目主要是国内学者的论文集结集和译介国外相关著作。为了改变学术界主要以初步研究成果和译著为主的局面，化情绪化的表达为深入的学理探究，更全面反映我国学术界在全球化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解答人们面对全球化的疑虑和担忧，应对全球化所提出的挑战，在学界凸显中国学者的声

^① (英) 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第 1 页，郭国良、许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01 年。

音，我们决定就全球化的一些热点和焦点问题，编写这套大型学术专著丛书。丛书设计了八个方面的选题：全球化与现代性、全球化与价值冲突、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全球化与文化整合、全球化与经济安全、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全球化与“第三条道路”、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我们认为这八个方面几乎涵盖了当前全球化理论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全球化与现代性》如一个硬币的两面，相互扭结，难分难离。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涉及我们对全球化本质的把握。全球化被许多学者认为是现代性（Modernity）一种世界性扩张，将现代性与近代以来的西方历史进程和资本主义制度文明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这些学者包括吉登斯、哈贝马斯、乌·贝克、罗伯逊等。吉登斯认为“时空的延伸”是使得跨越遥远时空距离的人类活动能够稳定地组织起来，这是全球化的前提条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时空的伸延”大大地延伸了社会关系的距离，使得复杂的全球关系网络得以形成。因此，吉登斯将全球化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强化，这些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遥远的地方联系起来：一地发生的事情受到千百里以外的发生的事件的塑造，反之亦然。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因为地方上发生的事情可能沿着与塑造它们的伸延很远的关系相反的方向运动。地方性的变迁既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又是社会联系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旁向延伸。”^① 根据这一定义，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是世界沿着现代性的四个维度（市场经济、监管、军事秩序和工业主义）的扩展。如果我们放开历史的视野，就会看到，作为现代性的核心理念的自由、民主、理性、市场经济制度等，也正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逐渐形成并完善起来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全球化与现代性是同卵共生、相互形塑的。

^① Giddens, A.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 64. 1990.

“第三条道路”是西方国家为了面对全球化的挑战的因应之策。“第三条道路”是20世纪末西方中左翼政党提出的一种新的施政纲领，它与以往欧美流行的所谓“第三条道路”不同，它不是试图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寻找中间道路，不涉及社会制度的选择问题，它实际上只是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一次改良。它对诸如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的关系、中左翼政党的群众基础、社会公正、积极的福利政策、个人的权力与责任、风险防范等问题，都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和回答，并对自己的施政纲领做出相应的调整。冷战的结束也使西方国家成了“没有敌人的国家”或者“不知敌人在哪里的国家”，“第三条道路”正是试图为这种国家提供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基础。它不仅有一整套完整的理论，更有一系列操作性很强的政策和措施，有的理念甚至渗透到个人生活的“私域”之中。这一理论特别为欧洲社会民主党、美国的民主党所鼓吹，因而名声大噪，近来虽有式微的迹象，但作为一度称雄的理论的确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厘清《全球化与“第三条道路”》之间的内在关系，对我们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并非所有的人都认同全球化，从西雅图到达沃斯，从曼谷到热那亚，反全球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是一对孪生兄弟，如影随形。反全球化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反对全球化的概念，认为全球化与国际化之间没有差别，全球化就是国际化或区域一体化。这种声音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已经变得十分微弱了；二是反对全球化的运动。全球化过程是充满矛盾的进程。它既可能是经验性的、描述性的，在一些人眼里它又是价值观的、规范性的。人们会基于不同的利益对全球化做出各种不同的反应。作为一种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的成分十分复杂。如反对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恰恰是美国的工会的人士。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反对全球化，落后的第三世界也反对全球化。这就需要梳理，在复杂的反全球化的现象背后，寻找不同群体走到一起的真正原因和推动力量。

在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过程中，人类文化的发展也表现出许多新的特征。主要来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文化多样性成为全球文化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文化帝国主义的强化成为全球文化发展的新问题；追求文化发展的先进性成为各种地域文化形式共同追求的目标。在此背景下，研究《全球化与文化整合》之间的关系，探求先进文化建设之路，符合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亨廷顿一篇《文明的冲突》引发了全球学界、政界的滔天巨澜，在世纪之交无数的冲突中人们从中隐隐约约地发现了文化的影子。在众多的诘问面前，亨廷顿不解地问：“如果不是文明，那是什么？”亨廷顿所理解的文明就是一种文化实体。如果不带偏见，亨廷顿的分析至少在现象层面上是有道理的。至于更深层的冲突由何而起，我们当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问题在于我们的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如何整合与发展。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在温情脉脉的文化整合的背后，价值的冲突却以血与火的形式上演着，《全球化与价值冲突》的关联日趋明显。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价值领域的冲突异常激烈，表现形式也异彩纷呈。政治、经济、文化的冲突，其核心是价值冲突。自由主义、新干涉主义甚至以武装冲突的形式肆无忌惮地表达西方的价值理念。东方主义与亚洲价值观的式微使传统价值观前景堪忧，也直接影响到其民族利益的表达。在全球化时代，价值的困境，是一个民族前进方向的迷失。这理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现实的价值选择和主导价值的确立亟待理论研究为之开辟道路。一位外交家提出过这样的疑问：“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宣传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然而许多战争都恰恰是用这些宗教的名义进行的，一个简单的解释似乎是，竞争促使人们力求比邻居过得好一些，尽管神灵要求人们帮助邻居。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再没有比表现在我们运用的一套价值

观上那么强烈了”。^① 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各种文化都有自己一套不同的价值观以及这些价值观的含义，世界必须摆脱那种对各种文化和各种宗教的肤浅解释”。我们要做的，“不是消除不同的价值观，而是提倡更好地理解、更好地尊重别的文化”^②。

作为一对尖锐的矛盾，表面看来，《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似乎势不两立。客观地看，面对全球化的冲击，民族国家首当其冲，全球化从根本上侵蚀着民族国家的根基。而追根溯源，民族国家是全球化的产物。全球性经济造成了国家的政治机构以及国家的经济控制政策与必须控制的国际经济力量之间的根本性分离。“全球经济创造出了一个不再是以国家政策主导经济力量的世界，而是一个由超越国家的地缘经济力量主导经济政策的世界。”“国家政府管理控制企业的时代结束了。”^③ 全球化的本性是不尊重国家主权，甚至要求摧毁一切国家主权而建立无国界经济乃至无国界政治，而一个国家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谋求发展，又要维护和伸张国家主权，这就构成一对矛盾。虽然全球化的主体是跨国公司，而全球化的推动力量却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问题、民族国家的认同问题、国家的职能问题、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问题等等，已经变得炙手可热。

“从全球着眼，从本地着手”（thinking globally, acting locally）是全球化时代西方十分流行的警句，它说明了无论全球化进程有多快，普及程度有多高，我们都必须从一个基本的事实出发，那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在跨国公司主导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从亚洲金融风暴、“9·11”事件中清

① （丹麦）奥斯特罗姆·莫勒：《全球化危机？》，第256页，贾宗谊等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

② 同上书，第258页。

③ （美）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第123～125页，周晓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醒过来的人们，看到了全球化狰狞的另一面。相对于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经济安全更为基础。我们既要构筑防火墙，又要建设防波堤。基础性的经济安全将保证国家在全球化的漩涡中心而不至沉没，也不至于在全球化的大潮中被边缘化。我们在热情拥抱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不能忘记《全球化与经济安全》的问题。

行驶在全球化惊涛骇浪中，人类的“泰坦尼克号”如果不至沉没，并力求到达彼岸，就需要治理。冷战结束以后，国际体系经历了一次结构性的转型——从两极向多极世界的转变，出现了“全球治理危机”，有的学者把它总结为三种趋势：地区和全球性国际制度和组织的持续和迅猛的增长；跨国社会运动以及非政府对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决策程序、政策和行动的不满；深植于经济、政治和社会不满之中的政治民族主义的复兴。^①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性问题的增多，在全球层次上实施一定程度的治理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但传统的治理方式局限于国家和地区的范围，在全球的范围内进行治理是超越传统治理理论的新课题，原有的治理理念面对新的现实的攻击。《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理应引起全人类的深入思考。

全球化进程与理论的开放性，决定了我们在本丛书所涉及的问题只是当前看来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相信全球化已经并将会带来更多的新的问题，我们的研究视野也会变得更为开阔。本丛书关注全球化理论本身的深入探讨，也关注全球化背景中凸显出来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我们认为不会有一成不变的全球化理论，同样，我们也不认为全球化问题会有一定的研究阈限和固定的研究模式。因此，整体看来，这套丛书尊重每位作者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而不是强求一律。

① 转引自《没有政府的治理》译序，第2页，张胜军、刘小林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对全球化，人们有着不同的观察视角，也就有了不同的研究结论。见仁见智，本不足奇。但人们在对全球化的实际进程并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不是进行事实分析，而是急于作价值判断，这本身也是不严肃的。我们不愿在诸如全球化的定义之类问题上停留，也不纠缠一些细枝末节性的问题。基于这样的考虑，对诸如欢迎还是拒绝全球化，现实是全球化的危机还是全球化的神话，全球化是西方化还是中国化，全球化是当下的进程还是古已有之，是发展趋势还是已经终结等等问题，我们不要求做过多的分析。诸如全球化是机遇还是挑战这样的问题，本身就不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全球化本身的复杂性和随机性，决定了全球化到底是机遇还是挑战是不确定的。一个事物对一个国家是机遇，对另一个国家可能是危机。今天是机遇，明天可能就变成了挑战。再如，多数论者认为全球化是双刃剑，具有双重性。令人疑惑的是，什么事物的性质是单一的？又有什么事情的作用不具有双重性呢？在全球化的研究中，类似的似是而非的观念令人费解，也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在一个全新的问题面前，我们的运思方式和所应用的研究方法是否亟待更新。我们力图在这套丛书中引入一些新的分析方法。结果如何，还待读者检验。

本丛书得以出版，要感谢湖南人民出版社熊治祁社长的大力支持，更要感谢丛书策划与责编张莉女士的辛勤劳动，没有她的一再督促，这套丛书的完成可能遥遥无期。同时，几位学术顾问对丛书的关心和指教，也令我们没齿难忘。

程光泉

2003年1月6日于北京师范大学

前 言

“全 球化”是 20 世纪后期出现的世界性风潮，这个词的含义，对于一般公众而言，是“心知其意”又难以言说的，而对于全球化问题的专家，尽管他们有更深的洞见，也往往会感觉相当含糊，因为一方面不同学科的学者、不同领域的从业人员，对于全球化的界说是不同的^①，要想得到一个全面的、内涵丰富的解释就显得困难重重；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趋势尽管十分明显，但是它至今仍然是一场“进行中的革命”，全球化的各种要素和特征也还在形成之中。如果单单局限于经济领域，界定“全球化”会容易一些。一般地说，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全球经济体系的形成，包括全球性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的形成，使得货币、商品、服务、资讯、工作和人民可以在各国之间自由流通，就像它们在一个国家内流通一样；并且所有这些市场都是“完全市场”，就是说，货币、商品、服务、劳动力价格等在世界各地都一样。当然，以上描述的是彻底全球化的经济图景，目前经济全球化还在发展之中，全球性资本、劳动力、商品三大市场只有资本市场接近于形成；由于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全球性商品及服务市场的前景比以往看好，但是要真正建立全球性的市场还需要克服许多困难；而全球性劳动力市

^① 经济学家倾向于从经济角度定义全球化，比如阿兰·鲁格曼认为，全球化可以定义为跨国公司跨越国界从事外国直接投资和建立商业网络来创造价值的活动；而像安东尼·吉登斯和约翰·汤姆林森等社会学家则认为，经济学家的定义太狭隘，全球化应该理解为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等领域内同时进行的复杂的过程，除了经济方面外，还包括社会关系的非本地化和文化杂化（hybridization）等等。

场的形成就更为困难。总之，仅仅就经济而言，全球化虽来势迅猛，但波及更广的全球化浪潮只是初现端倪而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全球化正在对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发生着影响，地球村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这种影响，但是仍然有人否认这一现象的存在，或者对它的前景表示悲观，英国学者阿兰·鲁格曼就是有代表性的一个。他指出，即便是在经济领域，全球化是否存在也很成问题，被乐观人士视为全球化的引擎的跨国公司，它们的行为是区域化的而不是全球化的，并且它们的影响只限于经济领域，迄今为止、并且未来也不可能形成强大的全球性政治组织和全球性文化。在他看来，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哪怕只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全球化，非但没有走向成功，而且已经走向终结。从而他对于全球化提出的结论是：“思维地域化，行动本地化，忘掉全球化”。^① 他对一般被认为是全球化的表征的各种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它们恰恰不是指向全球化，而是其相反的方向。

首先，在阿兰·鲁格曼看来，一般人认为世界贸易组织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它并不是一个强大的、有效率的组织，它只是由 200 多名贸易方面的律师组成的松散的组织，尽管它是迄今最有影响的世界性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经济组织一样，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也不是促进了全球化，而是促进了区域性生产、贸易和投资，“因为大部分降低关税和投资自由化是在双边上达成协议，从而是区域性的，而不是以一般的多边方式。”^②

其他区域性经济组织对于全球化也几无贡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出现祸福参半。在对外国直接投资采用引入关税减让、国民

① [英] 阿兰·鲁格曼：《全球化的终结》，引言，常志霄等译，三联书店，2001 年。

② 同上，第 16 页。

待遇原则的同时，自由化所得到的利益被新建立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所抵消。这包括影响墨西哥汽车和纺织品生产的限制性法规，这些法规有效地阻止它们进入美国市场。另外，许多服务行业，如卫生保健、社会服务、教育、运输和经济服务，都被排除在国民待遇原则之外，这就导致了歧视性投资措施的制度化。……特别是本地服务行业正受区域的和国家的保护，以对抗全球化和自由市场。”^①

而“欧盟 1992 年的单一市场措施和 1999 年的单一货币都表明欧洲内部各地区的贸易和投资的增加，而不是全球化的推进。奥斯特利 1997 年的调查显示，欧盟继续使用反倾销贸易补充法，采取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贸易措施……进一步表明欧盟在其成员国的公司和组织的游说下的封闭性。”^②

此外，亚太经合组织论坛缺乏进展。“除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再推进一步，否则全球化不可能兴旺；而没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区域性集团将继续存在。”^③ 总之，阿兰·鲁格曼认为，被乐观人士看成是全球化发展的种种征象，都只是使他得出相反的结论而已。

然而无论怎样，我们身边的生活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由我们所在国家或地区与外部世界的交互性引发的，不管你对正在发生的一切如何归纳、作何评价。在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的时代，一个国家的经济主要受本土资源、生产、贸易等等的制约，而当今世界，由于各国之间经贸往来的发展（无论这种往来是趋向于区域化还是全球化），一国之经济越来越多地受到境外因素的影响，因而经济安全与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等不同，是不能以一个国家的地域边界确定范围的。今天，有人形象地比喻：“全世界已经变成一座

① [英] 阿兰·鲁格曼：《全球化的终结》，第 16～17 页，常志霄等译，三联书店，2001 年。

② 同上，第 17 页。

③ 同上。

大赌场，赌台从地球的一端延伸到另一端。”^①因而任何一个国家的消极经济安全和积极经济安全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科技、贸易、全球投资等全球性经济要素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影响是怎样的？其前景如何？如何应对？这是每一个国家都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在入世过程中，我国经常说：“挑战与机遇并存”，这代表了我们对于全球化的影响的认识，实际上它可能不只在我国、而是在许多发达国家也同样适用。美国《芝加哥论坛报》财经记者、杰出的专栏作家理查德·隆沃思在《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危机》一书里，以敏锐的视角和通俗的语言、以丰富的资料向我们描述了经济全球化给西方世界带来的影响。该书研究了美国、欧盟、日本为首的第一世界在全球化浪潮中遭遇的尴尬：国内产业的出走，某些工业部门和工厂区的凋敝，中产阶级的贫困化和瓦解，就业机会减少或薪酬降低，外贸竞争力削弱，资本市场的风险增大等等。理查德·隆沃思指出，由于全球资源配置优化，发达国家确切享受了更为低廉的消费品，但是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总体下降，而受益者则是资本家和他们雇佣的高级主管。看来，在全球范围内，高歌猛进的或许只有全球化本身，在它的浪潮冲击之下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都是喜忧参半。

2002年是中国人世后第一个年头，这一年中国国民已经或多或少地感受到这一争取多年才得到的结果的影响了。比如，人们看到国产和进口汽车的价格都在大幅度下降，同时市场上泛滥的、从国外舶来的盗版软件和音像制品也有所收敛。在可以预期的未来，金融、服务、教育等领域也将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考虑到这一切，或许在匆匆而去的生活的急流中，我们真的应该稍事驻足，观察一下周围的变化，思考一下它的去向。《全球化与经济安全》这部书

^① 法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莱语，转引自[美]理查德·隆沃思：《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危机》，第3页，应小端译，三联书店，2002年。

就是一部驻足回思之作，尽管它做出的观察和思考都不可避免地是片面的。

本书所说的“安全”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括消极安全和积极安全两个方面，就经济而言，消极安全是指维持经济要素的稳定以及关系经济要素之组合的经济制度的稳定和持续，积极安全则可以和发展同义。在当今世界，不进则退，因而安全的本质含义是发展和进步。在笔者看来，“经济安全”本质上可以视为“经济利益”。“中国的国际经济利益是多方面的。目前已经有了一定发展规模的方面是国际贸易、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国际旅游、承包工程与劳务出口；刚刚起步的方面有海外投资、国际股市和技术专利出口；中国还有一个体制上的国际经济利益，就是与国际经济体系接轨。如果按照资金、商品、技术、劳动力的流向分类，我们也可以将中国的国际经济活动分为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种对外经济活动，也就是向外和向内两种不同的经济利益。如同一个硬币必然要有正反面一样，国际经济利益也有进和出的两个方面。向外的经济利益为商品出口、技术出口、劳务出口和海外投资等；向内的经济利益包括进口商品、吸收外资、引进技术、开发旅游、聘请专家等。……经济体制接轨的实质是引进国际经济的惯例和管理方法，改变我国内部的经济体制，使之与国际经济体制相一致。”^① 在全球化背景之下，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因而一国的广义经济安全直接与国际贸易、投资、服务的持续和发展相联系。影响经济安全的因素来自物质、制度、文化三个层面，物质层面的因素包括能源、交通、原材料、基础设施等；制度层面的因素包括上文提到的引进国际经济惯例和管理方法、改变我国内部的经济体制、使之与国际经济体制相一致，还包括法律制度的配套和保障；文化层面的因素主要指文化与制度的一致性和协

^① 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第12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调性。

经济安全是包括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科技安全等在内的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不是核心安全，但是，考虑到冷战之后和平竞争是各国角力的主要方式，经济安全对于一个国家的核心安全和总体安全具有基础的、保障的作用。由于冷战后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安全的地位明显提升，也由于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际，中国的经济安全面临新的、更大的挑战，国内对于经济安全的研究十分活跃，产生了不少有质量、有见地的著述。目前，这一类著述大多出自经济学家之手，主要从物质要素层面，也就是能源、交通、原材料的供给、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资本市场的稳定和发展等方面，或者从经济体制方面，也就是管理方法、经济惯例及其与国外协调的方面研究这一问题。本书的视角与上述著述有所区别，主要是从经济安全的法律保障入手进行研究，兼及文化因素的研究，也就是集中探讨了影响经济安全的制度层面（法律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因素，这些大体属于影响经济安全的外在因素，区别于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资本等内在因素。本书共分四章，第一章研究了科技安全对于经济安全的影响及其法律保障，主要探讨了我国现行的科技保密法律制度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对于我国科技和经济实力的影响，以及在入世之后应如何调整。第二章研究了环境问题对于我国经济安全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撰写这一章主要是基于近年来“环境壁垒”或曰“绿色壁垒”已经成为最为突出的非关税壁垒之一，因环境问题而产生的经贸摩擦对于国际经贸往来构成很大威胁，就我国而言，国际经济组织、规约有关环境与贸易和投资的规定，以及国际环境公约有关贸易与投资的规定对于我国对外经贸发展的影响越来越突出，而我们还缺乏应对的经验和理论准备。第三章从民商法、经济法、刑法等部门法入手研究了各种法律制度对于经济稳定和发展的保障作用，第四章则研究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我国经济的影响。前三章是从制度层面研究经